

广 播 电 视 中 专 教 材

中国教师史

李松林 张桂兰 编



北京市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1990

1990/2/13/K2

LSL-2 ZGL
13 1
K2 K2

目 录

第八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1)
第一节 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国民经济 的恢复.....	(1)
第二节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 制度的确立.....	(21)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41)
第九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48)
第一节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理论。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开始.....	(49)
第二节 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和在 纠正“左”倾错误过程中的曲折.....	(59)
第三节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执 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77)
第十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94)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全国大动乱...	(95)
第二节 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被粉碎.....	(106)
第三节 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 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115)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29)
第一节 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129)
第二节 历史的伟大转折.....	(140)
第三节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纲领的制定.....	(154)

第八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本章提示 主要阐述了建国初期，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斗争的光辉业绩和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八大的历史功绩等。

第一节 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 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一、建国初期的形势与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结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的历史时期。但是，建国初期的形势错综复杂。在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世界人民对新中国的诞生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可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特别是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它们不仅指使和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骚扰、破坏，而且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国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盘踞在华南、西南的某些省份和台湾等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退时遗留下来的

大批土匪、特务和各种反革命分子，也以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当时，还有三亿人口的新解放的农村，尚未实行土改，农民仍受着地主的剥削。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战争的破坏，本来就十分落后的国民经济，这时更陷于崩溃状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现代工业产值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左右，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一九三六年相比，重工业生产大约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生产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其中几种主要产品，钢下降百分之八十三，煤下降百分之四十八，粮食下降百分之二十五，棉花下降百分之四十八。由于工农业破产，城市失业人口高达四百多万，农村四千万灾民需要救济。再加上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的影响，投机商人的囤积居奇，造成市场紧张，物价飞涨和财政的严重赤字，人民生活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都面临严重的困难。

上述情况说明，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它的基础还不巩固。党和人民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巩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各项社会改革，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从而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开展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建国初期党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 在严重的财经困难面前，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而是领导全国人民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力争尽快恢复国民经济。

第一、迅速完成全国大陆的解放和统一。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东南、华南、西南进军，追歼国民党残敌，将民主革命

进行到底。人民解放军从建国前夕至一九四九年底，全歼了白崇禧和胡宗南主力，先后解放了广州、桂林、南宁、贵阳、重庆和成都，并和平解放了云南和西康两省。一九五〇年三、四月间，又解放了海南岛。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大陆获得完全解放就为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一个安定环境。

第二、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立即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全国百分之九十四点八的县已经建立了地方人民政府。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长期分裂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等岛屿外）前所未有的统一和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这就为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保证。

第三、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官僚资本企业是旧中国最庞大最集中的企业，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对官僚资本采取“原封不动，完全接收”的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全部接收了原属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切工厂、银行、铁路、矿山、商店以及其它企业，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与此同时，又通过征用、征购等形式逐步接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财产，并把它变为国家所有。这样，就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并且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从而为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战胜投机势力的破坏，

创造了基本的前提。

第四、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努力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党和政府从多方面进行工作。一是利用国家政权打击投机资本和投机商人，加强金融管理。国家颁布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和私相买卖。一九四九年六月，在上海查封了金银外币投机的大本营“证卷交易大楼”，依法惩办了一批投机操纵者，基本上制止了金银外币的投机活动。二是加强国家市场管理，集中物资力量打击投机资本。这种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主要手段，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即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纱布以稳住农村。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这一天，国家在资本家力量最雄厚的上海抛售大米九百一十一万斤。同年十月十日至十一月十日，抛售纱布达三十万匹。这样，有计划地抛售物资，就有力地打击了投机资本和投机商人，促进了物价的稳定。

第五、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为了克服过去处在农村和战争年代财政管理分散、混乱的现象，平衡国家财政收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统一全国财政收入；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由于决定的贯彻执行，国家财经工作实现了空前的统一。从三月份开始，物价就出现了下降趋势。以三月为基数，到五月底止，全国七大城市物价下跌百分之二十二，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趋向稳定，人民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不幸时代宣告结束。

第六、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抓了交通运输和农

业生产的恢复。一是抓了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迅速地恢复了全国大陆的铁路网；一是抓了农业生产的命脉，大力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此同时，还建立和发展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逐步地树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在市场上的优势。

第七、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在新中国诞生的当天，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公告电送各国政府，建议与各国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接着，许多国家承认我国并同我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到建国一周年时，已有二十五个国家承认我国，其中苏联、朝鲜、印度、瑞典等十七个国家已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挪威等国同我国正进行着外交谈判。此外，我国还同许多国家恢复了通商贸易关系，发展了人民间的友好往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至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维辛斯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二月十四日，两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签订《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对于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和我国的建设事业，对于保障两国的安全和维护远东的和平，曾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上述措施的实行，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但是我国的财政经济还没有根本好转，要实现根本好转，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为此，党必

须及时制定继续前进的主要任务和战略策略方针。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在我国物价趋于稳定，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之后，社会经济又出现了商品滞销，货币流速降低，银行存款骤增等情况，由此引起工厂停产，商店歇业，失业人员增加。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经济结构进行改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暂时的困难。为了广泛地团结人民大众，孤立和打击被推翻而未完全消灭的三大敌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九日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的报告》。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党在当时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并提出了实现这一任务的三个条件和要做好的八项工作，规定了党在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毛泽东着重指出：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条件，达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目的，毛泽东号召大家做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分子等八项工作。

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针对当时一些

“左”的错误倾向，指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及时地提出了建国初期的奋斗目标和策略方针，提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把工作重点从革命战争转移到恢复国民经济上来，具体地实施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工作的指导方针，七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报告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献，它对于迅速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抗美援朝和各项社会改革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 正当全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然命令美国军队直接参战，干涉朝鲜内政，同时，派遣第七舰队武装入侵中国领海台湾海峡。七月七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以美国军队为主组成所谓“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并把战火烧向中国边境。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坚决反对。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发出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一天，周恩来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宣布中国人民必将为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七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决定，以原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为主，改编为东北边防军，开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担负保卫祖国边防安全的任务。

美帝国主义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对和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纠集英、法等十五个国家的军队七万余人，在三百艘舰艇、五百架飞机的配合下，于九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在朝鲜中部西海岸仁川登陆，并疯狂北犯。周恩来于三十日再次警告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然而，美帝国主义却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于十月二日晨悍然越过三八线，接着向中国边境鸭绿江和图门江一带进犯，并多次派遣飞机侵入中国东北上空进行轰炸扫射，直接毁坏中国城乡建筑，杀害中国和平居民。他们狂妄叫嚣：“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行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赴朝作战。十月八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

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十九日，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密切合作，联合作战。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表示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出国作战初期，敌军的武器装备占有优势。其陆军拥有大批坦克、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空军和海军拥有大量性能先进的飞机和舰艇。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既无飞机，又无军舰，坦克、大炮也很少。面对优势装备的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充分发挥近战、野战、速决战的长处，灵活运用穿插、分割、迂回包围、诱敌深入等原则，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敌军。

从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歼敌二十三万多人，把美国侵略者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附近，恢复了被侵略者占领的朝鲜北部绝大部分国土，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战争的形势，迫使侵略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

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政府被迫接受苏联

政府在联合国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

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政策，并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谈判开始后，美帝国主义无理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阵地后方，妄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土地。当遭朝中方面严词拒绝后，美帝国主义狂妄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随后即对中朝阵地发动攻势，同时，还依仗其“空中优势”，以大量航空兵对朝鲜北部铁路干线和交通枢纽狂轰滥炸，发动“绞杀战”。

中朝两国军队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战局形势，在停战谈判的同时，在军事上采取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适时地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并开始在自己阵地前沿构筑永久性坑道工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夏、秋季攻势，歼敌二十五万多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迫使侵略者于十月二十五日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地点改为板门店）。此后，志愿军在二百五十公里的防御正面和东西两海岸，构筑了长达一千二百五十公里的地下长城——坑道防御体系，保证了战略防御作战的胜利。与此同时，新组建的志愿军空军和高射炮兵、工兵、铁道兵运输部队，在朝鲜军民的大力支持下，胜利地进行了反“绞杀战”斗争，建成了一条“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前方作战人力物力的供应。

美帝国主义公然不顾国际公法，从一九五二年一月开始，对中朝军民发动细菌战，遭到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十月十四日，侵略军又向志愿军的上甘岭阵地发动猛烈进攻，企图在志愿军的防线中打开缺口。美国侵略者先后动用三个

师共六万多兵力，三百二十多门大炮，一百七十多辆坦克，三千多架次飞机，在三点七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轮番进攻、轰炸，倾泄炮弹一百九十多万发，炸弹五千余枚，表面阵地被削低两公尺。志愿军指战员发扬高度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依拒坑道工事，在坚守阵地的四十三天中，打退了敌人九百多次冲锋，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击落击伤敌机三百架，守住了阵地，创造了志愿军依托坚固阵地进行坚守防御作战的光辉范例。

为迫使美帝国主义接受停战协定，志愿军于一九五三年五月至七月连续发动三次夏季攻势，歼敌十二万三千余人，收复土地一百七十八平方公里，迫使美军防线南移。在此形势下，美帝国主义不得不于七月二十七日在板门店同中朝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朝鲜战争终于以美帝国主义的失败和中朝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上将克拉克在签字时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百万优秀儿女奔赴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涌现出了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三十多万英雄、模范、功臣，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显示了人民军队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在志愿军赴朝作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即整个财政经济工作首先是以财力、物力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其次是保证国内市场的稳定，第三是进行各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

全国人民的支援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抗击美帝侵略的斗争中，经过三年零一个月的英勇奋战，共歼敌一百零九万三千八百多人，其中美国侵略军三十九万七千五百多人；击毁击伤敌机一万二千二百多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坦克三千多辆，各种火炮七千六百多门；缴获大批各类作战物资，消耗敌人军费二百亿美元以上。

抗美援朝的胜利，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中国的安全，保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加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全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行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土地改革运动 《共同纲领》规定“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新中国成立时，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尚未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地主阶级仍在剥削农民，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是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障碍。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成立了由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刘伯承、邓子恢、黄克诚等组成的中央土改问题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的土改工作。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起来了。

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明确的路线和政策，即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并强调实行有领导地

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自己起来打倒封建势力，取得土地的方针。

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除台湾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连老区在内，全国约有三亿多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农民每年间向地主缴纳三千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

土地改革是消灭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的一场伟大的斗争，是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制度的一场最彻底的变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它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以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镇压反革命运动 建国初期，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政治土匪约有二百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六十万人，各种特务分子六十万人。人民政府对他们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开展了剿匪反霸，反动党团分子进行登记，取缔反动会道门的破坏活动等。一九五〇年九月，美国插手朝鲜战争，国内各种反革命残余势力，认为时机已到，妄想配合美国的侵朝战争，里应外合，颠覆人民民主政权。有些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伸出头来破坏厂矿交通，抢劫物资，烧毁仓库，刺杀干部。有些曾经表示悔改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分子，也拒绝和逃避管制，与反动组织重新勾结进行破坏活动。一些恶霸地主乘机破坏土地改革，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有些地方的反动会道门造谣破坏，组织反革命地下军，阴谋策划反革命暴乱。据统计，从一九五〇年春到秋天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遭到反革命的杀害。一九五〇年，仅广西境内，反革命分子就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七千二百多

人，烧毁房屋二万五千六百余间，抢劫耕牛二百余万头。甚至首都北京也不例外。北京电车公司的特务分子一次纵火就烧毁了五十九辆电车。美国间谍分子阴谋在我国一九五〇年国庆时，用六〇迫击炮等武器，炮轰天安门检阅台，企图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一九五〇年三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十二月开始，一场群众性的镇反运动就在全中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在镇反运动中，党坚持群众路线，实行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对反革命分子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集中力量打击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罪恶尚不十分严重又愿意改悔的反革命分子，则给予宽大处理。

由于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到一九五二年底，基本上肃清了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复辟阴谋，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镇反运动的伟大胜利，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安定的社会条件。

三反五反运动 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党和人民政府又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在调整私营工商业中，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的办法。通过这些办法，一方面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生

产经营上的盲目性、投机性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使他们的生产、经营只能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当他们生产、经营有困难时，欢迎加工订货，当他们生产、经营情况好转时，就感到这些措施影响了他们赚取更多的利润，于是就抗拒国营经济的领导，用行贿等手段腐蚀拉拢国家干部，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有些资本家的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不仅把持着工商联合会、同业工会等合法组织，而且还秘密结社，组织了各种所谓“聚餐会”、“座谈会”、“联合生产处”、“联营社”等非法机构，实际上是不法资本家猎取政治地位、牟取暴利，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国营经济进攻、同国营经济抗衡的指挥机构。如重庆一些资本家就组织了“星四聚餐会”，并以它为核心，垄断了西南地区的钢铁业、造船业、机械业等，进行了一系列的严重违法活动。

不法资本家的“五毒”活动是普遍的、严重的。据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审查，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沈阳等八个大城市的私人工商业中，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竟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六，其中上海占该市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北京占该市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

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下，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经济部门内部，严重地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出现了蜕化变质分子。在党和国家的干部中，有的甚至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干部，他们在枪林弹雨的岁月里，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在全国胜利后的和平环境中，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蜕化变质，堕